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三分冊

學習和時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一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幹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幹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這些結論是：

(一) 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央認為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

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澈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

*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城所召集的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雖然糾正了從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線，改變了黨中央的領導機關的成份，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但是在黨的很多幹部中間，對於過去的錯誤路線的性質卻沒有作過澈底的清算。為着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黨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時期內，領導全黨高級幹部進行同樣的討論。這個討論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學習和時局』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對於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關於黨中央對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所作的詳細結論，參看本篇附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第七次全體會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爲鑑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二）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二）至遵義會議（三）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

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寧說，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三〕}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三）關於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討論。應該

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綫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佈了十大綱領〔四〕等，這些都是正確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缺點，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極大的重要性，以及還有其他若干缺點或錯誤。但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四）關於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在其後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五〕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央認為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選舉手續不完備，並以此作為歷史教訓。

（五）關於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應該指出，我黨歷史

上存在過並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次黨內兩條路線的學習，指出這種宗派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起了不良作用，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爲經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六)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一九四三年冬季開始的對於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學習，這樣許多次黨內鬥爭的變化之後，還有具備原來的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存在，則是不對的。過去的宗派現在已經沒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形態的殘餘，我們繼續深入地進行整風學習，就可以將它們克服過來。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着

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三)例如由於鬥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這一根據地和那一根據地的不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這一部分軍隊和那一部分軍隊的不同，這一種工作和那一種工作的不同）而產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團結的現象，看來好似平常，實則嚴重地妨礙着黨的統一和妨礙着黨的戰鬥力的增強。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指出這些原因，說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

以上所說的問題，如能在全黨獲得明確的理解，則不但可

以保證這次黨內學習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將保證中國革命一定得到勝利。

二

目前時局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法西斯陣綫的增強和法西斯陣綫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綫內部人民勢力的增強和反人民勢力的衰落。前一個特點是很明顯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會被打敗，日寇也已處在衰敗過程中。後一個特點，比較地還不明顯，還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歐洲、在英美、在中國一天一天顯露出來。

中國人民勢力的增強，要以我黨為中心來說明。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為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

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綫進攻，對它採取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爲輔的政策，而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爲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在那裏打些游擊仗罷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武漢以後，他們卽已開始改變這個政策，改爲重視共產黨，輕視國民黨；改爲以政治誘降爲主，以軍事打擊爲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而逐漸轉移其主力來對付共產黨。因爲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感覺國民黨已不可怕，共產黨則是可怕的了。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於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從武漢失守以後，由於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產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

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三萬多人的軍隊，因此爲日本軍閥所輕視。但到一九四〇年，黨員已發展到八十萬，軍隊已發展到近五十萬，根據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擔糧稅和兩面負擔糧稅的，已約達一萬萬。幾年內，我黨開闢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於能夠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但在此階段內，我黨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爲主，而輕視游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產生對國民

黨的投降主義，對於放手發動羣衆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同時，我黨吸收了廣大數目的新黨員，他們還沒有經驗，一切敵後根據地也都是新創的，還沒有鞏固起來。這一階段內，由於時局開展和黨與軍隊的發展，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驕氣，許多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了。在這一階段內，我們曾經克服了黨內的右傾偏向，執行了獨立政策，不但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創立了根據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爲第二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者爲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以後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爲主的方針改爲對共產黨爲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於共產黨領導的一切根

據地的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殘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擊我黨，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這一階段內，我黨根據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千萬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萬，幹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濟極端困難。同時，國民黨又認為他們已經閒出手來，千方百計地反對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國主義配合着進攻我們。但是這種困難地位教育了共產黨人，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如何反對敵人的『掃蕩』戰爭，『蠶食』政策，^(九)『治安強化』運動，^(一〇)『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統一戰綫政權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點，並且把第一階段內許多人自以

爲了不得的那股驕氣也克服下去了。這一階段內，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腳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爲國民黨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自衛鬥爭的這些情況，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過左的偏向，例如以爲國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過分地打擊地主，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等。但是這些過左偏向，也被我們克服過來了。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戰綫中又團結又鬥爭和以鬥爭求團結的必要，保持了國內和根據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爲第三階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爲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產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

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方面，立於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幹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擔和兩面負擔的，又已上升到八千餘萬，軍隊又有了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二十七萬，黨員發展到了九十多萬。

一九四三年，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政策沒有什麼變化，還是以打擊共產黨為主。從一九四一年至今這三年多以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華日軍是壓在我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身上。三年多以來，國民黨留在敵後的數十萬軍隊經不起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約有一半投降了敵人，約有一半被敵人消滅，殘存的和撤走的爲數極少。這些投降敵人的國民黨軍隊反過來

進攻我黨，我黨又要擔負抗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偽軍。國民黨只擔負抗擊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軍和不到百分之十的偽軍。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時間，日本軍閥沒有舉行過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只有幾次較大的戰役行動（浙贛、長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歸，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採取上山政策和觀戰政策，敵人來了招架一下，敵人退了袖手旁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的國內政策更加反動，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戰綫逐漸失利，美國的反攻增強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嚴重打擊之下，有搖搖欲倒之勢。爲救死計，日本帝國主義想到要打通平漢、粵

漢兩條鐵路，又以其對重慶國民黨的誘降政策還沒有得到結果，有給它以再一次打擊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舉進攻國民黨戰綫的計劃。河南戰役^三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脫離兵，軍脫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幾個師，也是一觸即潰。這種情況，完全是幾年來國民黨厲行反動政策的結果。自武漢失守以來的五年半中，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擔負了抗擊日僞主力的重担，這在今後雖然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後必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到了那時，我黨抗擊敵僞的任務又將加重了。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